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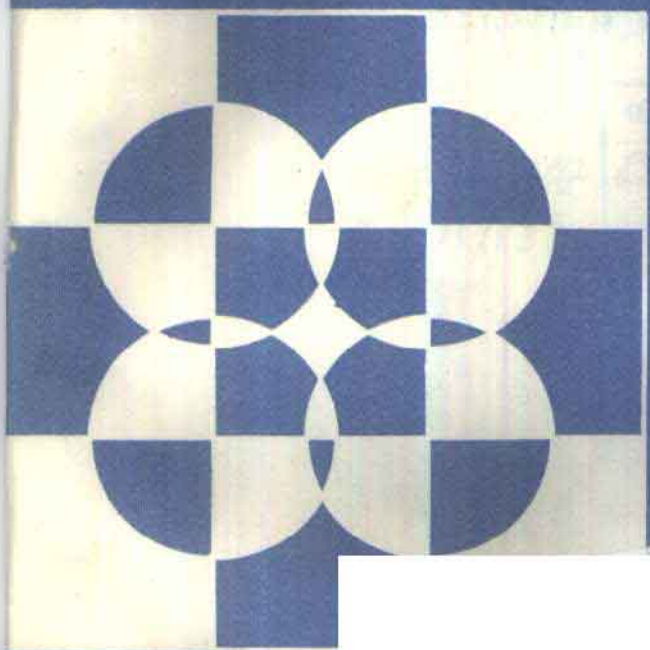
小说与现实

刘锡诚 著 花城出版社



小说与现实

刘锡诚 著



花城出版社

950482

小说与现实

刘锡诚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400册

书号 10261·307 定价 1.05元

前 记

对于文学事业来说，批评和创作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二者的关系好比是雄鹰的两只强健的翅膀。虽然有时候创作跑在前面带动理论批评，有时候理论批评又跑在前面带动创作。只有创作的发展而无批评的活跃，这创作终究会在一定的水平上停滞下来；只有批评的勃兴而无创作的繁荣，这批评终究也会在某个时候消沉下来。一个民族可能长于理论思维，另一个民族可能长于形象思维，但从一个时代来讲，批评与创作大抵是相扶相济、相得益彰，而不大可能处于长期脱节状态的。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果不怀有偏见，大概都会承认，文学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转换，生活和创作又向文学批评提出了许多需要回答的新课题。文学批评如若不从现在的水平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创作也将不得不受到一定的限制，较难有大幅度的突进。我想这里丝毫没有夸大文学批评的意思，只是想从历史中找到一点规律而已。

今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省涿县召开了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了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意义、步骤、措施，无疑将会大大地推进我们的文学批评的开展与提高。党的十二大

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总任务后，文艺界正在为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局面而展开一场深入的讨论。文学批评也必将会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出现新的面貌。作为文学批评战线上的一员，我愿意在推进文学艺术新局面的事业中贡献出自己涓滴的力量。

编入这本集子中的大都是近两年写作的小说评论。我把它题为《小说与现实》，实际上不过是一鳞半爪，名不副实，并不能展示出这两年小说创作的风貌。在编选和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得到花城出版社的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作 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于北京

目 录

前记	1
----------	---

文学与当代生活

——谈新时期文学的社会作用	1
---------------------	---

时代·现实·新人	15
----------------	----

文学是真实的领域	24
----------------	----

谈小说创作中的市侩习气	33
-------------------	----

作为一种思潮来看

——评《波动》及其他	40
------------------	----

谈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50
--------------------	----

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辩难	66
-----------------------	----

漫谈作家的创作个性	82
-----------------	----

关于提高小说创作质量的思考	89
---------------------	----

小说创作展望	97
--------------	----

激动的作家们

——从小说创作看近年的中国文学界	103
------------------------	-----

与人民同呼吸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文艺	113
--------------------	-----

从崛起到繁荣

- 谈一九八〇年的中篇小说…………… 123

深刻些，再深刻些

- 一九八一年的小说二题…………… 129

在坚实的道路

- 张一弓论…………… 137

柳溪之为柳溪…………… 157

谈尤凤伟的短篇小说…………… 166

《蒲柳人家》的艺术特色…………… 174

面对生活的矛盾

- 读陈中冀的《职责》…………… 180

《但愿人长久》的得与失…………… 186

不仅要思索，还要追逐生活的脚步…………… 189

《当代女作家作品选》(3)后记…………… 191

许茂形象的塑造…………… 195

论《黄河东流去》的艺术成就…………… 212

郭祥性格琐谈…………… 229

评《云崖初暖》…………… 234

严峻的生活之路…………… 240

谈《暴风骤雨》及其评价问题…………… 244

略论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 257

文学与当代生活

——谈新时期文学的社会作用

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同时又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继续和发展。新时期文学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它努力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持、恢复和发展了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和人的精神领域里的变化。新时期文学主要是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也包括用新的观点反映历史生活），又反过来给现实生活以巨大的推动，在拨乱反正、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几年来的文学发展，证明了文学反映当代生活的关键是作家是否反映社会矛盾。凡是作家正视社会矛盾时，创作就取得较大的成就，凡是须臾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矛盾，那么，文学就不能正确而真实地反映出当代生活，也就脱离了人民的需要和社会主义的需要。

—

当代生活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文学只有面对生活中的矛

盾，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才有强烈的时代感，才能拨动读者的敏感的神经，才能为广大读者所理解，所关心，所欢迎。文学能否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是文学能否成为千千万万民众服务的文学的关键，也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所在。新时期文学由于渗透着上述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受到广大读者极其热烈的欢迎。人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和生活画面，因此他们感到文学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中的，是同他们的生活、事业、爱憎、理想息息相关的。文学与群众的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密切了。回顾建国三十年来，还很难找到哪一个时期象新时期文学一样，当一部反映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某种共同心理和情绪的作品问世时，如此受到不同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如此能够给读者以生活真理的启示，给读者认识历史的钥匙。

许多作品问世时赢得了万千读者的如醉如狂的欢迎。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确是不多见的。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原因是复杂的，关键是这些作品或回答了读者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或触动了读者某些心理和感情的神经。例如《班主任》发表时，许多读者都是含着热泪读这篇作品的。这是因为它以特有的时代感震撼着成千上万读者的心灵，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思想感情，“说出了我们经常萦绕心头，想说而未说出的心里话”。《人到中年》发表时也是如此。如果说《班主任》发表时，人们的心理是刚刚从长期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而对某种刺激有一种敏感的反应的话，那么，到一九八〇年初，社会生活已经平静了几年，人们的心里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很不容易被某种刺激鼓动起来的。但《人到中年》的出现却象水潭中投入一块石头，立刻激起了连天的波浪，社会被一篇小说激动起来了，

舆论被陆文婷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所吸引了，当时人们是怀着怎样一种不安的心绪读这部小说的呀！特别是当陆文婷从医院里出来，在她的丈夫的搀扶下艰难地回到自己清贫的家里的那些场景，虽然迎面投过来一线阳光，预示着希望就在前面，然而却仍然不免带着人生的苦涩味道。这样的遭遇，这样的笔墨，有多么巨大的撼人力量啊！这篇小说所以引起如此轰动，不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为许多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吗？！

这种一部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一首诗能拨动成千上万读者心弦的情况告诉我们，文学作品可能取材于不同的生活领域，可能写的是不同阶层的人物，但它总应该或多或少反映某些较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反映了某些较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又具有深厚的社会意义的作品，才能在群众中造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反之，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而仅仅满足于挖掘一点个人小小的悲欢，或者玩赏一些眩人眼目的雕虫小技，那样的作品是很难受到群众欢迎的。最近，巴金同志在回答问题时说，他在写作时就是着眼于人物的命运，他把文学作为武器攻击他的敌人，他不赞成现在有些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有些同志脾睨这些反映了一定社会问题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必然导致“从问题出发”的倾向，必然导致艺术上的粗疏，必然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我则以为不然。且不说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曾明确提出过，俄国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的历史任务，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就文学创作的实践而言，

真正从生活里发现出、开掘出为中国人民所关注的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问题即重要社会矛盾，而这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问题即重要社会矛盾又得到了艺术的体现，那末这样的作品就肯定是有价值的，是能够反映出时代面貌的，因而也自然是有生命力的。

二

文学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现实的重要手段之一。它通过对一系列人物形象以及这些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描绘，再现出无比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来，从而使人们受到感染，得到启示，使人们认识生活的本质。在今天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得多的时代，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五年来，文学在把握和描绘我们当今的时代方面，是有成就、有贡献的。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变时代。变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人们常说，最卓越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在转变时代，亦即与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关的时代出现的。我们这个转变的时代，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产生卓越艺术作品的时代；而这种卓越的艺术作品又往往是描写这个转变的时代的。近几年创作和发表的大量作品，首先是小说，其次是话剧和报告文学，再次是诗歌，极其深刻而出色地描绘了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着的历史性的转折和生活中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变革过程。

剧烈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在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中间引起巨大的反响。要描绘出这种种社会变革在不同阶层人士心理上、精神上的投影、感情上的潮汐、政治上的态度以及人们相互关系的变动与调整，那就会极其真实生动地反映出这些大变革的本身及其历史意义，从而也就成功地描绘和概括了一个时代。《乔厂长上任

记》是一部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成功地写出了在一场社会大动荡之后走上太治的时期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拨乱反正、调整改革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画面。尽管作者笔下几个人物的典型化程度有所不同，但通过对乔光朴、冀申、郝望北、童贞这些人物及其纠葛的描绘，再现了当代社会关系的变化，展现了社会变革是不可阻挡的这一总的趋向。乔光朴这个人物形象，既概括了在艰难时世下锐意改革的人物的共同的精神状态，又流溢着经过作者集中了的、人民群众中对未来的希望、憧憬与理想，因而它成了新时期文学中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一个创业者、开拓者形象。乔光朴成了一个共名，他被作家创造出来，又从作品中回到了社会生活中去。人们把那些锐意改革的人物称为乔厂长，各行各业都有乔厂长式的人物，乔厂长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自己的地位。有一位当代著名作家说过，高度的艺术不仅是反映生活，而是参加到生活里面去，同时改变生活。几百年以来，拉曼奇地方的那个骑士（指唐·吉珂德）遍游全世界；几百年来，哈姆雷特在那儿痛苦。所以，历来艺术的全盛时期的特点倒不在作家们用实有其人的姓名称呼自己的主人公，而是用虚构的主人公们的姓名称呼生活中的人们。这话说得很精辟。正如果戈里在创造出玛尼罗夫、梭巴开维支、罗士特来夫之前，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物，鲁迅在创造出阿Q之前，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物一样，蒋子龙在创造出乔厂长之前，生活中就有乔厂长式的人物，只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形态，周围的人们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而一旦作家们创造了这样的形象，他们就固定化了。乔光朴是一个个性化了的艺术典型，但他的精神状态、素质却是社会上许多人身上都有的，特别是他那种忧国忧民、坚决果断、锐意改

革的精神，表现了我们这个转变时代的时代精神。这篇小说的作者蒋子龙后来又写了好几部作品，也都是以变革为主题（如《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变革中写人物，并特别着力于写创业者、开拓者形象的系列，在他自己的人物画廊里，已经有了几个性格迥异而很有个性的形象（如车篷宽、刘思佳等）。

《祸起萧墙》也是以变革为主题的作品，它从工业发展的体制（条条与块块的矛盾、掣肘）、革新与守旧的冲突等许多方面写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的心灵的碰撞，人的关系的动荡与组合，当现实生活还没有提供或还没有可能提供解决矛盾的现实可能性时，作者执拗地把他的主人公、开拓者形象系列中的一员——傅连山引导到以身试法的困境中去。傅连山的性格没有得到多方面的揭示，因而不免显得缺乏丰富性与说服力。但，即使如此，这个形象仍然有自己的艺术力量，他体现着我们时代的变革的特点，没有社会变革的现实性与迫切性，也就不可能有这个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所以存在，又有赖于社会变革的现实生活。尽管对傅连山这个人物的评价存在着一些分歧，这篇作品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特别是在水电战线上引起的反响，是相当强烈的。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写了一个中央机关的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争斗。无论从作者张洁个人创作题材的开拓和深化方面看，还是从概括以变革为特征的时代风貌看，都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这部作品在一般读者群众中和工业领导部门的读者中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以主题的迫切性、尖锐性、深刻性和生活画面的新鲜、独特而吸引着读者。至于作品中存在的明显的缺点，相信作者在听取各界的批评意见后会修改得更加完善。

政治领域、经济领域里发生的变革，在人们思想上、精神上造成的连锁反应，同样是新时期文学驻足的一个领域。人们的思想

正在从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从长期个人迷信的愚昧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到自觉地、科学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前景的伟大实践中去。人们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变革，是历史性的、意义极为深远的。反映人们精神的觉醒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蓝蓝的木兰溪》里的赵双环，从顺从盘金贵的意志到对抗盘金贵的意志，这标志着她精神上的觉醒和行动上的叛逆。一向连狗都不如的冯么爸，终于挺直了腰杆，敢于向乡场上的支部书记和罗二娘这类有权有势的人物表示了抗议，显示了做人的尊严。连年吃不饱肚皮的“漏斗户”主陈奂生，终于分到了钱，而且住进了五元钱一宿的县委招待所，其精神世界发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种类型的人物，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宋薇，《蝴蝶》中的张思远，他们在经历过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之后，终于从各自织成的茧壳中爬出来，清醒过来。他们觉醒的过程当然是痛苦的，几乎要同他们已经获得的地位、待遇相决裂，才能真正获得认识的自由，因此他们比起冯么爸、陈奂生来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但由于他们精神觉醒的过程是社会大变革所决定的，因而也是不可逆转的。他们心灵深处那种要改变自己还是维持现状、似觉悟非觉悟的灵魂的碰撞和颤悸，是非常真实、典型而动人的。描写出灵魂的碰撞、颤悸直至完全觉醒，精神上的升华，这就揭示出了生活的真理，并且能够给人启示，使读者的灵魂也得到净化。

三

任何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们的成就大都建立在对当代生活的思考与概括上；任何有成就的艺术作品，其成就也往往取决于

对当代生活反映的深刻程度。这当然不是说，作家不能和不应写过去的生活和古人的生活，过去的生活和古人的生活也可以而且理应成为作家写作的题材，但在写作这些题材的时候，要求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处理，体现出当今的时代精神。如果是出于回避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新情况，而把目光转向过去、转向古人，象近来有的作家的创作中出现的苗头那样，则是不可取的。

这几年，由于作家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映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对历史(主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重新认识上面，虽然近两年来已经逐步转移到表现当代生活上来，但毕竟因为时间不长，加上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来不及写出有分量的、能够反映时代的作品来。尽管如此，作家们对当代生活的若干重要方面和重大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深沉的思考与研究，并陆续有作品问世。

这几年来，作家们在思考现实方面的总的特点是，逐步摆脱根深蒂固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南，一切从实际出发。建国以后的十七年间，“左”的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和一九六二年九月以后，这种影响表现得特别突出。不少作家在观察、思考和概括生活的时候，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指南，创造性地观察和研究无限丰富的生活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简单地、刻板地照抄照搬党在某些时期的具体政策、关于某些社会问题的结论，用这些政策和结论代替自己的观察研究。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在许多作家所写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体现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样统一的格局，所不同者仅仅在于代表正确路线、正确思

想和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的人物名字不同而已，无非是你的作品里先进的书记是张三，他的作品里是李四。这种刻板地照抄照搬党的某些政策和某些结论，简单地把政治概念移之于文学作品之中的做法，把文学创作变成了政策的“传声筒”。我们知道，政策是根据某种具体情况制定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就应当用新的政策代替不再适用的政策。政策的变化，往往使图解某种政策的文学作品失去价值。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长期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影响到作家把无限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或几个大的公式，大家都按这个公式来写，这就导致了公式化倾向的出现。诚然，十七年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创作了一大批反映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不能轻易抹煞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力于两个方面：作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排除“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扰，提出独立的见解；或者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接受了“左”的错误观点，但在具体描写生活画面和塑造人物形象时，却忠实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因而达到了或部分地达到了生活的真理。但毕竟不能不承认，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严重地妨碍了文学本来应该达到和可能达到的成就。而这几年作家们在研究和描写当代生活时，则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独立地、创造性地、具体地研究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一切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现成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重大矛盾冲突，从而对社会生活、社会矛盾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提炼出了若干有意义的、发人深思的主题，情节，人物，构思。

近几年，作家们在探索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对封建思想残余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形态及其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

阻碍，提出了新的看法。描写这方面生活内容的小说，开掘得比较深。比如以描写农村里的爱情婚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其中写了两代人的婚姻，妈妈的一代在祖国解放初期就已经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到存妮和荒妹这一代，却又回到了封建礼教猖獗、自由爱情遭到扼杀的时代。作者开掘出这样一个思想，即存妮与荒妹的悲剧并不能归咎为父母或邻里的思想的落后，精神领域里封建观念的抬头归根结蒂受着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这个解放已经几十年的山村里，由于生产力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精神文明也就无法提高，连青年人那点比较原始的爱情也被残酷地窒息了。人们从小说的画面里看到，封建思想正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反封建的任务仍然很艰巨。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封建专制主义在我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方面的遗毒，仍然是大量存在的，我们的作家在这些方面作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描写。比如官僚主义作风与封建家长作风的结合，成为当今干部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特点，二十多年前，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曾大力讴歌过的那种“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的时尚，在今天的作品里变成了对脱离群众的干部的谴责与鞭笞。特别是农村这个舞台，这几年的文学以大量笔墨描写了干群关系出现的变化，随着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的实行，群众在那些患有官僚主义和封建专制综合症的干部